

编辑 徐磊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王坤 电话:64101837 iris812@163.com

高端访谈

典当业突围需兼顾风控与创新

——专访宝瑞通典当行执行官徐云鹏

2018年是新中国恢复典当行业的第31年，同时也是典当行正式划归各地金融办进行监管的元年，监管部门的变化及行业属性的调整对典当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银行信贷机构积极向小微企业倾斜，小贷公司等类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典当行业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双重竞争。面对变化和挑战，宝瑞通典当行执行官徐云鹏认为找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是典当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此外，组建过硬的鉴定专家团队、差异化业务创新、改善客户体验也是帮助典当行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典当作为最古老的行业之一被称为现代金融业的鼻祖，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先出现典当活动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虽然由于一些原因曾被终止，但在恢复典当业的31年里，随着企业对小额、短期、快速融资服务需求的旺盛，典当行业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

根据全国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典当企业资产总额为1668亿元，同比上升1.3%，负债合计123.2亿元，同比上升8.7%。从总体盈利情况来看，2017年总体盈利能力上升，全行业实现营业利润17亿元，同比上升8.6%；净利润10.4亿元，同比增长3%。然而，行业亏损面与亏损额较上年有所上升，其中出现亏损的企业有3100家，亏损面达36.5%。

其实，作为小众行业的典当业一直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能够把控风险也成为典当生存发展的关键，此外，资金、专业人才稀缺等问题也让不少小型典当行难以长久在市场中立足。在徐云鹏看来，对于金融属性较强的典当行业来说，风险控制是首要任务，如果没能衡量好流通常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等问题，典当行就无法满足客户与员工的双重需求。

面对小贷机构的兴起和典当业固有

的风险压力，各家典当行都在积极探索创新发展的道路，以满足客户日新月异的需求。除了经营房产、汽车的抵押和借贷业务外，民品典当也是宝瑞通业务中的重要板块。此外，为了增强典当行鉴定的权威性，宝瑞通组建了汇集国内外顶级鉴定专家的“百人专家团”，建立了国内领先的奢侈品鉴定数据库。宝瑞通希望通过业务的差异化创新，让典当不止于资金周转，更在于盘活资产；让典当不止于消费，更在于文化体验和收藏投资。”徐云鹏表示，“这些坚守和创新也有效地控制降低了企业的运行风险。”

随着今年典当业交由金融办主管后，典当行业也进入了发展的新纪元。徐云鹏认为此番举措更加肯定了典当的金融属性，在金融办相关条例的指导下，典当企业能够更好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他表示，典当包含金融和流通两个属性，宝瑞通一直致力于典当金融属性的开发，因此划归金融办主管将更加有利于我们开展典当金融服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加强典当流通领域的开发，在商场内开设寄卖店铺售卖B端供应商的产品，甚至未来还希望能将寄卖板块建设成面向C端的二手奢侈品流通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 马嘉会 宗泳杉

人物专访



■北京商报：就宝瑞通而言，特色业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云鹏：宝瑞通致力于解决中小微企业的应急融资，因此业务重点主要聚焦在如何让客户能够最快捷和便捷地拿到资金。目前，宝瑞通最快的一笔业务达到了4小时工作时间就放款的速度。在民品典当方面，我们建立了“百人专家团”，通过这一模式增加民品鉴定的权威性，同时更好地配合绝当品销售。此外，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让更多的大众享受到典当行业的专家鉴定资源，我们的“百人专家团”也向民间开放鉴定业务。

■北京商报：除了建立“百人专家团”外，在民品典当方面宝瑞通又进行了哪些创新？

徐云鹏：我们希望民品典当业务能够做的不仅仅是消费，更多的是文化体验，产品涉及古董珠宝、限量珠宝、世界十大名表、传统手工

金器等多个门类，并经过权威鉴定中心的鉴定以确保珠宝、名表等当品价值评估的客观性和可信性。同时，宝瑞通鉴定中心建立了奢侈品鉴定数据库，并与中国商业联合会钟表眼镜商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达成合作，共同推动国内钟表鉴定标准的建立。

■北京商报：面对市场中的诸多挑战，您认为典当业的出路在哪儿？

徐云鹏：创新至关重要，未来宝瑞通将依然聚焦典当业金融属性的创新，我认为创新分为经营创新和管理创新两类，虽然在核心模式上创新并非易事，但在产品和服务上创新仍有很大的空间。比如除了房产、民品、汽车外，能否丰富抵押物的种类就是我们在不断探索的方向之一。而在服务方面，我们也在逐步推动通过互联网为客户提供O2O服务，探索传统企业+互联网的新模式。

资讯



黄胄《草原颂歌图》珍藏40年首次亮相

近日，黄胄美术基金会、北京保利拍卖在炎黄艺术馆为即将亮相北京保利秋拍的黄胄巨制《草原颂歌图》举行揭幕仪式，这也是其被珍藏四十年后首次亮相拍场。

黄胄是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高峰，是中国美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草原颂歌图》，创作于1977年，高123厘米，宽69厘米，纸本重彩设色，画面以近、中、远景三段组成“之”字形构图。与黄胄先生众多取材边疆生活的创作相比，本作有几点特殊之处。首先，本作以蒙古族群众为主体，其间穿插了维吾尔族、朝鲜族和汉族青年，这种以多民族欢聚一堂来体现民族团结的作品，在黄胄先生的作品中并不常见；其次，人们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于同时期画作中亦不常见；名款“子蓬”，则极少见。

此幅作品堪为黄胄先生的少见精心之作，饱蘸着艺术家的热情，尺幅不大，却迸发出极大的力量。群体人物欢聚歌舞的一刻被他精准地用画面永恒留存了下来，无论是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慈祥的老年乐师，还有远景的羊群和牧马人，都被他融洽地安排在一个画面中，近景中每个人物表情动态各不相同，但画面整体却繁而不乱，可说表现了黄胄作为近代伟大艺术家非凡的场景控制能力和动态造型的捕捉能力。画面中扑面而来的歌颂祖国，向往美好生活的热烈气氛很难不感动每一个看画的人。

难得的是，黄胄在40年前创作这幅作品时，其夫人郑闻慧和女儿梁缨都充当了画面人物的模特。郑闻慧坚持来到现场向大家讲述黄胄创作这幅作品时的情景。“这张画虽

然尺幅不大，但黄胄在画的时候是经过‘文革’磨难之后才画的，所以画的时候非常用心，可以说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里头。”

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东表示：“在当时的年代，这幅作品所传达出的积极热情是很重要的，人物情感丰富，可谓黄老创作时期最好的作品。”黄胄学生、著名画家史国良表示：“黄胄先生的《草原颂歌图》发表得特别多，好多画集里都出现过。因为当时他正处在特殊年代，所以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他的画非常有生活气息，也非常生动。如果没有丰富的实地生活经验，这种姿势是很难想象和编造的。这张画尺幅不大，但场面很大、很深远，层层叠叠来烘托这种深远感，这些都是传统绘画里没有的，是黄胄先生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

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